

盧瑋鑾

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黎活仁

《日影行》一書《黃塵萬丈》那篇中的寮母，我去年重訪京都時聽說是在母親節接受少女獻花時，一下子因感動過度，於是就結束了她在塵世的旅程。這種在大都市早已泯滅的純真，常常使我回憶起過去在那兒所接觸到的人和事。

我認識盧女士的時候，她才開始寫這本書，盧女士以前是中學教師，故此創作多以學生為對象。《日影行》無疑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在京都生活過一段日子的人，才會領悟到她的文筆其實溶合了當地舒

緩的節奏。因為保釣運動的影響仍在，所以民族意識常常見於字裏行間。如果現在動筆，大抵就沒有這一時代的烙印。除此之外，她都扮演着一個藝術欣賞者的角色。前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準備出版海外遊記，徵詢於我，記得覆信之時順便附上《日影行》一冊，此後一直沒有回音。也許國內只會欣賞柏葦遊大觀園式的《東瀛漫錄》吧！

《日影行》中說到那個買到老舍簽名本的人就是我，後來胡絮青女士來港大訪問，我就請她題簽，這是我的藏品中比較有價值的一本。十幾年前，我和好幾位大學同班同學都很仰慕阿英、鄭振鐸等藏書家。那時阿英輯的幾種晚清文學叢書都已絕版，我偶然在「學生書店」（已經拆掉）買到阿英的《域外文學》一種，一直珍之重之。到文革後傳來噩耗之時，不禁為之黯然。有一位同學現在還保持買書的癖好，一套套包紮妥當，放在床底下，繼續做其藏書家的夢。而我呢，這幾年左搬右搬，深感中國文化的厚重，以及現實的無情。是的，差不多所有日本學者都是個小藏書家，而且研究的熱情到老而不衰。這

種鏗而不舍的精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那時候我們有機會閒談之時，總企圖找出答案。

北白川一帶的舖子在闊別多年之後，不少已換上新的面貌。去年重遊之時，又特地到人文科學研究所旁邊的喫茶店懷舊一番。記得十三年前，我和盧女士初次見面時在那兒談了一個下午。大家都認識到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進展迅速，國人應當加倍努力。據說去年有人問北大教授季羨林有關「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的感想，季教授表示不能同意。但是，能看懂日文的人，都覺得這的確是客觀的事實，而且也很真實地反映出一些日本學者的態度。那時文革仍在中後期階段，我們在在擔心現代文學會出現「敦煌」之於「敦煌學」的局面。

日本學者的研究，我最早接觸到的，是鈴木正夫的《郁達夫資料》，那時剛有濕機影印服務，而且尚在五毛錢一張的階段，圖書館職員破例以「教員專用」的一部機給我這個四年級學生印出有文字說明的一部分。我雖然不能通讀，但非常佩服他的研究精神；如是十多年，他的郁達夫研究從未間斷過。我們那時剛着手選個別作家進行研究，《郁達夫資料》無疑起過啓示作用。鈴木教授去年曾兩度來港，一是在春節，那時我還在京都；六七月間到美加旅遊之際，想不到他又飄然而至。前年開始，因資料的交換，我跟鈴木教授開始有了書信的往還。最近在《復旦學報》（一九八四年六期）看到演講稿郁達夫與日本文學，鈴木教授在裏面提出了個有趣的見解，他說「私小說」有兩類，郁

達夫不屬「調和型」（把創作與生活調協妥當）而屬「破滅型」（因創作使生活受損害）。某日通電話時順帶跟盧女士提起，她也覺得很有意思，並認為屬「破滅型」的，還有郁達夫的友好徐志摩，兩者所感受的思潮不同，但強烈表現自我一點，却令他們的生活以至生命，都有偶然或不是偶然的「不幸的遭遇」——我和盧女士就這樣經常交換意思，以及學術情報。

盧女士在京都時已着手蒐集豐子愷的遺文，後來選擇其中一部份出版了《緣緣堂集外遺文》，論編校的謹嚴，也許是香港開埠以來所僅見的。她回港後，轉接得知豐氏的下落，還記我在京都買了竹久夢二《出帆》寄往上海，據聞豐氏收到書的那天還在日記錄下此事。此後我又買了第二種竹久夢二的畫冊，但豐氏却過早辭世，未能及見。我的同學中有一位是豐子愷迷，他經常勸人不要垂釣，並多次解釋在鈎上的魚蝦死亡前掙扎的痛苦，此事使我想起這幾年頻頻到港九兩地的靈堂弔喪時所聽到的死者彌留時的遺事。

人生是短暫的，對時間流逝迅速的感傷，如藤野岩友的論文所指出，在《楚辭》就有了，《古詩十九首》繼承這種傳統，却又提出「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願意看到「敦煌」之於「敦煌學」的局面，那樣《離騷》那種珍惜生命以至念念不忘建功立業的思想，就值得大大提倡。在一九七三年盧女士快要回港時，我記得曾經跟她說過如果大家將來有機會踏足大學的講壇，一定要設法改變目前的現象。想不到當時大家都認為是過分理想的願望，在一九七八年竟變成事實，我們分別

在香港兩所大學講授現代文學的課。應該更值得慶幸的，是當年的豪情壯志，未付東流。

留意學術動態的人都會知道：各地文學運動史的研究，這三年來有很大的進展。盧女士對香港戰前的文學活動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她把往日的舊報刊歸類整理，編成檔案。最值得注意是她發掘出幾篇蕭紅去世前在香港發表的重要作品，如《北中國》等，令蕭紅傳為之改寫。有一次酒酣耳熱之時，我跟馮亦代先生開了一個玩笑，說如果四人幫得到盧女士編的檔案的話，有幾十個人可能要提早進八寶山，而閣下那陣子也難得安寧吧！馮氏後來在某篇文章語及此事。據知徐遲在北京時就知道香港有他的「檔案」，去年來港時竟真的就在盧女士的檔案櫃中找到了昔日在香港發表的舊作。

輯錄戰前作家所寫香港印象的《香港的憂鬱》，是盧女士研究的副產品。該書出版時，適逢香港文運的熱潮，頗引起重視。

互相讚美以至互相歌頌，似乎是台灣的風尚。本來何謂台灣作家或台灣學者，甚難下定義。恐怕有「字義」癖的人，看了此文，會重新把我歸類。

多年前《開卷》編輯部找我去訪問某女士，這位名作家一見我們出現，就連忙往臉上敷粉，而且輕描淡寫的說：「我還有這份虛榮。」這篇文章的主角本來是盧女士，可是當我重頭讀一次之時，覺得自己趁機作了不少刻意的打扮，借某女士的話來作辯解，也實在合適不過。（一九八五年一日三日完稿）